

化解天津大暴動

(本文插圖刊第十頁)

吳鑄人回憶錄(四)

● 吳鑄人原著 · 王成聖校訂

北伐大軍將近百萬

民國十六年四月，國民黨清黨之後，寧漢雙方本應通力合作，揮軍北伐，但因武漢方面對清黨及容共意見分歧，李宗仁、白崇禧乘機逼迫蔣中正總司令下野，蔣中正先生辭職下野，東遊日本，北伐因而停頓。孫傳芳殘餘部隊於此時乘機渡江，節節進逼南京。幸好東路軍總指揮何應欽會合李宗仁、白崇禧率領之第七軍，在龍潭將孫傳芳部打得潰不成軍。「龍潭之役」以後，滬寧局勢遂告底定。這年冬天南京方面國民黨於上海召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預備會，商討黨內團結合作大計，決定敦請蔣中正回國復任總司令，繼續領導北伐。(蔣中正時在日本爲了與宋美齡女士結婚事向宋太夫人徵求同意)

民國十七年二月初，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正式集會於南京，黨內各派意見至此復歸統一。

在南京整飭黨務會議上，中央決定國民黨黨員均需重新辦理登記，同時各省市黨部要成立黨務指導委員會。我仍被派回直隸，任直隸省黨務

指導委員會九個委員之一，兼訓練部長，並兼代宣傳部長。到天津後，格外加強宣傳三民主義、喚起民衆、推動革命、組訓青年、蒐集情報等工作，以協助北伐軍的進展，爭取勝利的早日來臨。

民國十七年一月蔣中正總司令復職後，改組北伐軍，共編成四個集團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由蔣中正以北伐全軍總司令自兼，馮玉祥爲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爲第三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爲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四大集團軍總共統軍將近百萬展開全面總攻，以收復北京天津統一全國爲目標。

第一集團軍自徐州沿津浦線北上，於六月初逼近天津。第二集團軍沿平漢路北進，於五月下旬逼近北京。第三集團軍沿京綏路東進，於五月中旬逼近北京。第四集團軍於平定後方中共湖、廣暴動後，也於四月下旬加入北伐，沿京漢路北進，協同第三集團軍作戰，於五月中旬逼近天津。六月二日，張作霖看大勢已去，放棄北京天津要逃回東北去。專車出關，在皇姑屯爲日本人所炸死。六月八日北伐軍收復北京，六月十一日收

復天津。張作霖的兒子張學良，因痛恨日本人炸死他的父親張作霖，於七月在瀋陽通電全國宣言保護安民，十二月東三省易幟，通電表示服從國民政府。於是紛爭擾攘達十七年之久的中國，終告統一。

戳穿大騙局大陰謀

在北伐軍攻進北京天津一帶的時候，也正是我們華北敵後工作同志與軍閥鬥爭最慘烈白熱化的時候。但就在這最緊要的當口，天津發生了一件驚人的大事：

中國共產黨直隸省黨部的負責人韓靈符，眼見國民政府北伐軍收復京津在即，爲了破壞我們的勝利成果、阻撓北伐的順利完成，乃不擇手段的假藉國民黨名義，組織了一個「中國國民黨天津市黨部糾察隊」企圖製造暴動。韓靈符在糾察隊組成後立刻跑去見北伐軍第三集團軍前敵指揮傅作義(宜生)，要求在天津發生動亂時以武力支援。這項要求立即得到傅作義的同意。傅作義下令，全軍每個人，連傅本人也不例外，都必需綁上一環「中國國民黨天津市黨部糾察隊」的臂



①吳鑄人（坐者）民國二十年與北方革命同志合影於北平市。

②吳鑄人（右四）在立委任內與同仁外出考察時留影。



章。這真是一著極陰狠、卑劣、借刀殺人的毒計。

在此事發生的前一天，北伐的先頭部隊已到達北倉，離天津只有二十華里（約十公里），所以城內情勢更形緊張。在當晚的檢討會上，我們已得知中共有陰謀想要搞暴動。於是我就對張清源說：「清源兄，你和傅宜生（作義）很熟，韓靈符這件事至關重要，非全力阻止不可。請你明天一早務必去和傅宜生取得連繫。」第二天不知什麼緣故耽誤了，張清源沒和傅作義見面。這才給韓靈符捷足先登的機會。於是當天下午整個天津市，甚至租界區，都出現了所謂的「中國國民黨天津市黨部糾察隊」！

我一看情勢危殆，不容再有絲毫猶豫，就以我兼代宣傳部長的名義，擬了一篇新聞稿：「中國共產黨之大陰謀——假藉中國國民黨名義，組織偽糾察隊，企圖在天津製造衝突、發起暴動。查本黨（中國國民黨）直隸省黨部臨時執行委員會轄下之天津市黨部，並未組織任何糾察隊，務希各界明察。」當時之所以採發布新聞的方式，因為報紙是當時傳播最快、最廣的媒體。也是戳穿共產黨陰謀製造暴亂最有效的辦法。

寫好新聞稿後，立刻拿著稿子去見當時天津幾個大報的負責人。首先走訪的是大公報的張季鸞。張季鸞依老賣老，不把我的話看在眼裏。我費了許多唇舌，他都無動於衷。最後我又急又氣，說出了狠話：「共產黨今天所進行的陰謀，目的是製造濟南式的暴動。如果天津二百萬人的安全因暴動而發生問題，所有嚴重後果，一概由貴

報負責。」張季鸞一聽我說出這樣嚴肅的狠話，不像是出自少不更事年輕人之口，便連忙說：「我們登，我們登。不過原稿我們可能要增刪一點。」我說：「可以，但是裏面主要的意思絕不能更改。」他點頭答應了。

新聞報導預弭動亂

隨後我急赴庸報。庸報那時也算是天津的一個大報，屬研究系。接著就直奔天津益世報。這家報紙是天主教辦的，銷路很廣。次日，庸報、益世報登的全是本市欄的頭條新聞，大公報登的地位比較差一點，但也相當醒目了。大公報之所以不那麼熱衷，因為當時它還不是一個對國民黨很友好的報紙，屬於政學系。後來態度的轉變，是由於我私人和胡政之、傅力漁以及張季鸞等人的交往，又加上陳布雷先生的拉攏。

傅作義看到報上的新聞，大吃一驚，才知道受了共產黨的欺騙（韓靈符自然也不敢再去見他了）。大怒之下把臂章撕了，立刻下令所有糾察隊一律繳械。後來傅作義見到張清源說：「唉呀！清源兄，你怎麼來得這麼晚啊？幾誤大事，幾誤大事！韓靈符跑來看我，我還以為他跟你們是一夥的，真是意想不到的事件陰謀。」一個大騙局，大陰謀，被報紙及時公佈，使一場幾乎發生的大動亂，就這樣被我以四兩撥千斤的手法給化為烏有了。

我一生經歷不少大風大浪，認為處大事要「執簡馭繁，舉重若輕」。尤其對於一樁可能爆發的大禍，最好能在暗中把它化解於無形。一旦問

題已經發展到台面上，再來補救，已不是上策了。醫學上強調「預防勝於治療」，左文襄公（宗棠）也有「徙薪宜遠，曲突宜先，所以防患於未然」的名言。我生平處理問題，都以這些理念作為準繩。當然，在我二十七歲第一次與中共交手，破除了他們企圖在天津搞大暴動的陰謀，倒不是我有什麼特殊經驗與學識，那只能說是基於平時的訓練和急中生智，激發潛能所致。這也許就是孟子所謂的：「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罷了。

創辦訓練消除工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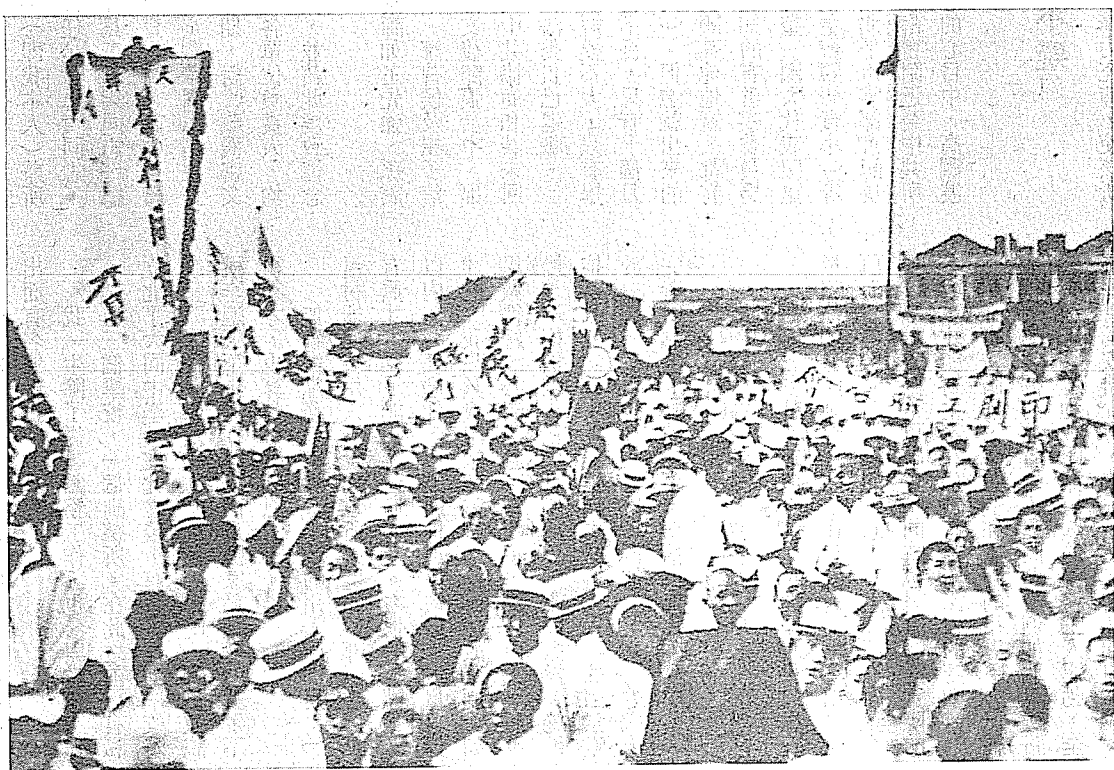
民國十七年，北京天津次第收復之後，蔣中正總司令於這一年夏天率領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第一集團軍前敵總指揮何應欽、白崇禧等將領，政壇要人戴傳賢、吳稚暉以及國民黨中央委員張繼、李石曾等共赴北京西山碧雲寺孫中山總理靈前致祭。這是中國國民黨北伐軍進入北京所做的第一件大事。當時北京市民來道歡呼，盛況感人。

局勢底定之後，「北京」改稱「北平」。天津市升格為特別市，天津市黨部因而升級為特別市黨部。「直隸省」更名為「河北省」，省政府、省黨部均設在北平市。

河北省黨部遷移到北平以後，我就自我檢討：過去雖然在工作上略有表現，但其中一半是靠衝勁，一半是靠運氣；由於忙於工作，以致荒廢了學業，要以當時的學識、經驗來擔當省黨部委

(下) 天津各界慶祝北伐勝利閱兵盛況。

(上) 民國十八年元旦閱兵大典，蔣介石總司令（前排右二）、閻錫山（前右三）、馮玉祥（前右）在閱兵台上留影。



員、訓練部長等重責大任是必然不夠的。因此打算：第一，返回北京大學讀書，完成學業；第二，出國深造，待學成後再回國服務。

然而事與願違，平津初定，百廢待興，黨務工作一時實在無法擺脫，而且下級黨部更加幼稚，急需加強訓練。當時丁惟汾先生任中央黨部訓練部部長，廖維藩先生是他的主任秘書。我作河北省黨部訓練部部長，當然是由丁惟汾先生直接領導。

有鑑於黨務工作的亟待加強，中央決定各省市黨部得設黨務訓練所；每所以招考六十人為限。我因河北省有一百二十九個縣市黨部，每一縣市至少應有一至兩名優秀黨員接受訓練，才能達到為黨培養幹部的目的。於是將意見呈報丁惟汾先生。蒙他核准，我便集中全力，籌備河北省黨務訓練所。分別在北平、天津及保定市招生。招考工作由崔子信同志主持，我負責最後的面試。全省一共錄取了一百九十二名學員。這些學員訓練結業之後，分發到各單位從事愛民親民的服務工作，消除工潮學潮的危機，對安定地方，維護政權發生很大的助力。

主持招生的崔子信同志，於民國三十七年平津淪陷前，任河北省保定行政督察專員，在與中共聶榮臻部隊作戰時陣亡。所以我要在此特別追念他。

教育成果績效優良

河北省黨部各訓練所的組織與制度都十分健全，師資水準高，學員素質好，所以教育訓練成

果績效優良。茲簡述如後：

(一)組織方面：由訓練部長（即我本人）兼所長。教務主任前後有兩位：首任是蕭忠貞同志，次任是許孝炎同志。訓育主任為王禮錫同志，總務主任是童耀華同志，皆具教育長才。其中王禮錫同志是段錫朋先生所推荐，童耀華同志是稅務學校高才生，在作敵後工作時期，對收藏機密文件等事務表現突出。所有上述各單位負責人，均已作古，撫今追昔，不勝感嘆，並藉此虔致悼念之忱。

(二)師資方面：所聘請的講師如王先強、孫震宇、蔣子孝、盧郁文、羅貢華、鄒曾侯及崔子信，都是一時之俊彥。其中盧郁文後隨張治中、邵力子、劉斐、李蒸等去北平與中共協商和談未回，至今下落不明。羅貢華是立法委員已退職。

(三)教育成果：教育訓練所規模不大，只有學員一百九十二人；訓練期間也不長，只有十個月（較其他訓練所尚多出四個月），但造就出來的學員，後來無論在河北省或全國其他地區，都有很傑出的表現。較為人們所熟知的有監察委員馬慶瑞，前台灣銀行董事長馬兆奎，國大代表田崑生、范金泉、張希文（來台後主辦國語實小）等。此外，抗戰勝利後任國民黨北平市黨部書記長的高瀾波，於大陸撤退時，在南甯附近為中共所俘不屈而被殺害。在眾多同志的心目中，高瀾波是一位有為有守的卓越人才。

量材器使用人不疑

我任所長時年二十七歲，精力充沛，使該所

在當時全國二十多個黨務訓練所中，算是較為突出而有名氣者之一。

我一生除了從事黨務工作，也參與教育工作，辦過三個學校，一個訓練所。在此之前，有私立北平大同中學。在此之後，有中央政治學校附設蒙藏學校，以及私立香港輔仁書院。雖不敢說桃李遍天下，但在各方面為國家為社會造就了不少人才，也算是略感欣慰的事。

無論辦黨務、辦教育，我的用人原則是：「量材器使，用人不疑」。所遴選的幹部，必然是有真才實學，能夠勝任愉快者。在他的職權範圍以內，我任憑他，也鼓勵他放手去做，盡量發揮才能，我只負責決策和監督，絕不無故牽制。如果做得好，必有獎勵，做錯了，責任由我一肩承擔；不能稱職或竟失職者，立刻予以撤換，絕不拖延。我認為，不論任何事業，「人」的因素重於一切。只要能知人善任，再加上健全的組織，完善的制度，必然會事半功倍，無往不利的。

懇切勸說勞資雙方

在河北省黨務訓練所學員的實習期間，我盡量讓他們參與實際黨務工作。因為要培養出一位頂天立地、精明幹練的好同志，主義理論固然重要，經驗尤其不可缺少。同時也只有透過實際的參與，才能對主義和理論有專精深入的認知。

在實習階段，學員們在講師的指導下，已經能很好的掌握河北省的工運問題。例如北寧鐵路的交通工人運動，開灤煤礦的礦務工人運動，全能妥善的安排疏導，成效斐然。在此期間，較大

的工運問題發生在民營的久大鹽廠和永利碱廠。勞資糾紛的關鍵是資方對勞工的壓榨剝削，導致工人醞釀罷工。資方在工潮高漲時派代表到黨務訓練所，請求出面調解。

我對他們說：「今天工人罷工不是沒有原因的。你們不妨先仔細的算一算，至少要賺多少錢？工人的工資至多能給多少錢？我們不能讓工資增加過多，搞得你們賠本，工廠垮了，工人無工可做，也不是個辦法。反過來說，如果你們只顧自己賺錢，剝削工人的血汗，即令沒有今天的工潮，我想你們用起這些「血汗錢」來，良心上也不安。所以依我之見，現在先把賬目估算清楚，總要使得你們有錢賺，工人的生活也過得去，雙方各讓一步，在這個原則之下，問題自然就容易解決了。」資方代表一致贊成這一原則。

協調折衷平息工潮

經初步協調，勞方大多數人也同意以這個原則來解決問題，但是中共藉機挑撥煽動，以致少部份工人持反對的態度。於是我把反對者的代表找來，很坦誠懇切的對他們說：「各位朋友是靠工廠工作來養家活口的。工廠給的工錢太少，不合理，我們當然要起來爭取。可是如果我們須要很高的工資，弄到資方虧了本，最後停工關廠，這對我們絕對沒好處。工廠是我們吃飯的傢伙，好歹不能把它給搗垮掉。」幾經折衝，反對者總算也同意了我所提的原則，從而一場罷工工潮就此順利平息了。

在這個時候，我深深感念陳果夫先生曾給我

的教益和啟發。回憶往事，早在民國十六年，我在國民黨南京中央黨部初次晉見果夫先生時，他曾對我說：「勞資雙方的利害基本上是一致的。其間發生了問題，我們除了要在資方所能負擔的能力範圍內，盡量提高工人的工資，以增加他們的收入之外，更要在福利方面，創辦消費合作社，以減少工人的支出。直接的減少支出，也就等於間接的增加收入。」這些話，對於我當時以及後來辦理華北工運，有很大的幫助。我之積極提倡工人福利，勸導他們創辦消費合作社，也都和果夫先生的教益有關。

由於黨務訓練所在工運上的表現，使河北省黨部在勞資雙方建立起很好的誠信，而奠定了河北地區勞資合作的基礎。

婉謝資方捐贈款項

這段期間還發生過一件小插曲，在調解久大和永利工潮成功之後，資方知道我在北平還兼辦著一個大同中學，為了表示對我的謝意，他們願意捐款。我笑著說：「多謝你們的好意，可是我不能接受。現在我如接受你們的捐款，等於接受賄賂。將來我如辭去訓練部的工作和職務，而大同中學需要錢時，或者我們還可以商量。此刻我絕不能以我私人辦的學校來接受你們的捐款。」提這段插曲，絕非標榜自己的清廉無私，而是在証明，無論是機關或個人，要取信於群眾，必需要有為、有守。

「黨務工作」主要是一種群眾工作。我一向認為，從事黨務工作，不但要向社會高階層求發

展，以期枝葉茂，更重要的是，要為社會中下階層，尤其是為低收入勞工的大多數人謀福利。只有不斷的向下紮根，才能根深蒂固，蓬勃發展。因此「基層工作」是黨務工作的重心所在。黨的觸角應該無孔不入，黨的力量應該無遠弗屆，黨的影響力應該能夠促進三民主義之實現，五權憲法之確立。

回顧一下國民黨革命之所以能推翻滿清，打倒軍閥，知識份子的領導固然功不可沒，基層群眾運動的成功發展尤屬居功至偉。過去無論在抗戰之前或勝利之後，我在華北辦理黨務，首重基層工作，為中下階層謀福利。由於能夠掌握群眾中大多數，所以屢次在和中共的鬥爭中始終居於上風。大陸淪陷，關鍵因素只有一個：在全國性的群眾工作上，我們輸給了中共。中共在籠絡、利用群眾的手法上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投機政客挑撥離間

北伐軍進駐北平天津，全國統一之後，民國十八年，年初中國國民黨在北方的政情大體都很單純穩定，同志也十分純潔無私，但其中有一個領導者卻野心勃勃，在黨內興風作浪，此人已經在海外逝世多年，為存忠厚，不寫出他的名字，以某某代替，但事實不能不加以記述。

某某的領袖慾很強。這並非壞事，壞是壞在他的觀念和方法：他認為，自己若要出人頭地高在上，必須先打擊排擠別人。某某要排擠的第一個打擊目標是追隨國父孫中山多年的黨國元老，張溥泉（繼）與李石曾兩位先生。指稱張繼是

「西山會議派」，李石曾曾是「無政府主義派」，合稱為「西無派」，並叫出打倒「西無派」的口號。由於他想抓權做「河北王」，因而破壞了北方的黨內團結。其次，他又想架空陳果夫和丁惟汾兩位先生，公開說推舉他們做名譽領袖，實際上是自己抓實權。

在國民黨內，除了組織，對於黨員還有一個「道統」上的要求，那就是黨齡先後的倫理觀念。某某為一己之私，完全不把這種倫理觀念當一回事。

當時在汪精衛策劃領導下，黨內有了一個新的派系——「改組派」。某某一方面與改組派領袖之一的顧孟餘聯絡，一方面又與南京中央陳果夫、丁惟汾來往；他一方面與汪系暗通聲氣，一方面又向中央頻輸忠誠。所以對於第三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他又想參加，又不想參加，充份顯示他腳踏兩條船的心態。第三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中的裂痕，完全是由某某一手所造成。這是怎麼回事呢？因為張溥泉、李石曾兩位先生對某某深惡痛絕，極力反對他當中央委員，他一氣之下，不顧大局，竟然在開大會時中途退席，因而製造了一道黨的裂痕。

是非不明善惡不分

民國十八年，馮玉祥、閻錫山情況不穩。那年夏天蔣中正先生北上視察，目的是想以黨的組織和群眾力量來維持北方軍事的安定。某某卻發動不歡迎蔣中正北上視察的運動。

在省黨部會議中，秘書處報告說收到中央黨

部來電蔣中正組織部長即將前來平津巡視黨政軍狀況。於是我發言說：「現在我們發動群眾歡迎已經來不及了，但是我們省黨部全體同仁應該到車站去迎接才對。」其中有位年高德劭的老同志王宣就開口了，他說：「鑄人兄，這種送往迎來的官僚作風，你是打那兒學來的？」我一聽之下，大光其火，說：「一位朋友遠遠從南京來，如果事先知道，我們尚且要到車站去接他，這是人情之常，何況蔣中正先生是我們國家的領袖，在黨方面，是中央組織部長，於公於私我們都該去接，這怎麼能叫作官僚作風？我不知道你講的官僚作風是如何定義？」會議氣氛頓時變得嚴肅起來了。正在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蔣中正先生的副官來傳話：「明天上午主席要到省黨部來視察並訓話。」當晚蔣先生把某某叫去大罵了一頓。

我曉得某某的個性是：「腊燭不點不亮」。果然第二天他的態度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宣佈召開歡迎大會，歡迎蔣主席蒞臨省黨部訓話，但卻貼出一幅具有挑撥性的大標語：「歡迎黨的唯一領袖蔣中正同志」。

當我和張清源二人陪同蔣主席進場時，蔣主席疾顏厲色的說：「這種標語以後不能貼，免得將來發生誤會！」我當時心裡很難過：由於某某的前踞後恭，招致蔣先生的批評。後來由於某某的暗中把持河北省黨部，黨務、人事搞得烏煙瘴氣，中央乃決定改組河北省黨部。

綜觀某某的一生，實在是箇不折不扣，投機取巧的政客。民國三十七年在大陸變色之前，還曾經投靠過李宗仁。雖然某某與我是多年老友，

但就事論事，我認為民國初年，北方黨務在某一時期的表現的相當混亂，其責任應歸於某某一人。國民黨人才多，力量大，所以遭到失敗，就是投機政客奪取了黨政要職，鬥爭忠貞之士，是非不明，善惡不分，所以招致失敗，令人浩嘆。

有人乘機造謠誣告

民國十八年夏，蔣中正主席視察河北省黨部後，一氣之下打電報命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陳果夫先生北上，商量改組事宜。正在蔣先生氣頭上，不巧又有人乘機造謠，捏造了一條消息，說：「新西山會議派領袖吳鑄人的陰謀」：吳鑄人召集河北省黨務訓練所員生，在西山秘密開會，組織小團體，藉此把持黨務。」這顯然是想在黨中傷我，破壞黨中央對我的信任。

這個消息傳到當時住在北京飯店蔣中正主席耳中，便立刻召我去問話。當時周佛海先生和陳布雷先生都在那裡。承他們好意，先告誡我說：「小心點，主席現在正要發你的脾氣呢！」我很坦然的回答說：「我不怕。我們所作所為，都是以黨的利益為出發點，絕對大公無私。他要發脾氣就發吧。」

蔣中正先生接見我時，眉頭一皺，面現怒容，說：「嗨！你在搞些什麼名堂？你看！」說著就把別人告我的狀子丟在我面前。我頓時覺得不便解釋，解釋起來也很費唇舌，恐怕還會越描越黑。原來背景因素是這樣的：當年入黨參加革命，曾和幾位忠實同志組織過一個「中山主義實踐社」，主要成員是北大、朝陽、師大的學生，其

作者吳鑄人晚年的照相。



中來台、港的有李壽雍、許孝炎、伍家有、賀其新、任培道及林伯雅等人。北伐完成後，中央要我們解散，我們的組織幹部就立刻答應解散。由於我們的組織只是為了與軍閥及共黨鬥爭，為國

民黨的利益而成立，北伐既已成功，這個組織也就沒有必要了。我們是甘願為黨的整體利益而解散的。於是實踐社執行委員會向大家報告了組織及解散本社之經過，並請同志們今後全力為

黨工作，不要再有任何小組織、小圈圈了。

蔣公中正一笑了之

一個如此複雜的問題，一時不知如何向蔣先生解說清楚，何況他也沒那麼多的閒工夫來細聽我講。於是我就簡單扼要的向他報告說：「蔣先生，您不要奇怪，我在河北省做黨務工作，從民國十六年到今天已經兩年多了。在這兩年多裏，我所負的責任是河北省黨部委員兼青年部長、訓練部長、宣傳部長以及河北省黨部黨務訓練所所長四個要職，以我的年齡、學識、能力和經驗，實在不足以承當這麼大的責任。我是個安徽人，到河北來從事黨務工作，可以說是人地不宜，不過我早已置個人利害榮辱於度外了，所以尚能團結同志，不辱使命。至於遭受當地同志排擠不滿，本是意料中的事。今天有人對我惡意中傷，發我的傳單，實在不足為奇。就如蔣先生您在廣州，共產黨誣您是『新右派』的領袖，試問，我們能相信嗎？」蔣公中正被我這一問，便笑起來了，以很愛護部下的口吻對我說：「好了，好了，以後小心謹慎一些。」對於他人的誣告，一笑了之。

我辭退出來以後，周佛海、陳布雷趕著問我被訓情形，我只說：「沒什麼，他叫我以後做事小心謹慎一些就是了。」他們異口同聲的說：「那是好意，那是好意。」可見布雷、佛海兩位先生當時都對我十分關愛。

我的確不是一個口齒伶俐的人，但在緊要時刻，卻能言而不繁，發而中節。（未完待續）